

延边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纪念

● 王 臻 金泰国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史学

研究集

shixueyanjiuji

延边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纪念

● 王臻 金泰国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史学

研究集

shixueyanjiuj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研究集/王臻,金泰国主编.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634-2880-9

I. 史… II. ①王…②金…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856 号

史学研究集

主编:王 臻 金泰国

责任编辑:朴莲顺

封面设计:金胜铉

出版发行: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133002

网址: <http://www.ydcbs.com>

E-mail: ydcbs@ydcbs.com

电话:0433-2732435 传真:0433-2732434

发行部电话:0433-2133001 传真:0433-2733266

印刷: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2.125 字数:335 千字

印数:500 册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7-5634-2880-9

定价:26.00 元

前 言

FOREWORD

延边大学历史系创立于1949年。60年来,历史系立足于我国朝鲜历史教学与科研的最前沿,瞄准本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加强学术创新与教育创新,为我国朝鲜历史教学与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历史系已成为延边大学的龙头专业之一,拥有历史教育与国际文化两个本科专业方向,世界历史(朝鲜史方向)与中朝日三国关系史两个硕士点,世界历史(朝鲜史方向)博士点,世界史学科被吉林省教育厅确定为省重点学科。本专业设有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国际文化(朝鲜历史)三个教研室,拥有朝鲜历史、中朝日关系史、渤海史等三个研究所,其中“渤海文化研究基地”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历史系现有在编人员27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14人,博士生导师8人(外聘3人),硕士生导师11人,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有20人,目前已形成了一支年龄、学历、职称结构比较合理的教学科研队伍,具有强劲的发展潜力。60年来,历史系共培养了约1500名各类毕业生,他们分别

活跃在中等学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地方政府、驻外使馆等机构部门。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系将全面贯彻校、院“十一五”规划目标和改革任务,进一步更新教育理念,树立创新意识、责任意识和现代意识,突出专业特色和地域优势,努力将历史系建设成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将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成国家级重点学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朝鲜史学派。

为了集中反映建系 60 年来历史学科的科学研究成果,为广大延大史学工作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们组织汇编了本部史学论文集。其中的作者既有退休老教师,又有在职教师,也有部分历史系博士生。在编排体例上,我们将论文分为“退休教师篇”、“在职教师篇”和“史学博士篇”,每一部分又按照历史发展时间进行编排。

需要说明的是,论文集中每位作者的论述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有不当之处,还望专家学者多加批评指正。

王臻 金泰国

2009 年 9 月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1)
----------	-----

退休教师篇

1. 《王会篇》所载东北主要古族考述/刘子敏	(1)
2. 渤海火炕再考/方学风	(18)
3. 论 1231 ~ 1260 年间蒙丽战争与外交之争/朴文一	(33)
4. 中国朝鲜族在抗日斗争中的“双重使命”问题/朴昌昱	(45)
5. 浅谈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崔洪彬	(57)

在职教师篇

1. 《三国史记》“鲜卑国”记事研究/李玉顺	(73)
2. 唐罗联军灭亡百济述论/苗 威	(85)
3. 试论六世纪中叶新罗的崛起及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 /金锦子	(98)
4. 论元对高丽的通婚外交举措及其目的/金 春	(109)
5. “壬辰倭乱”与明抗倭援朝刍议/王 臻	(119)
6. 中朝两国四次抗日的战斗友谊/张增香	(132)
7. 浅析清代禁越政策的演变与朝鲜人“犯越”/李勇植	(142)

2 史学研究集

8. 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思想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姜秀玉 (155)
9. 试析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与和平外交策/于海君 (173)
10. 试论“乙巳五条约”/朴哲 (189)
11. 论20世纪20年代龙井的社会文化环境/金泰国 (198)
12. 东北朝鲜族人民反对日本领事馆警察统治的斗争
/李洪锡 (211)
13.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族的民族政策
/康鸿鹏 朴今海 (228)
14. 试析朴正熙政府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金光照 (242)
15. 朝鲜核战略与东北亚地区的核扩散/姜龙范 (255)

史学博士篇

1. 从《皇华集》看中、朝文化交流/王克平 (269)
 2.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陈放 (285)
 3. 朝鲜北学派实学的特点及历史地位/李英顺 (292)
 4. 关于东西文明交流史的几个问题/孙泓 (304)
 5. 相互依赖的中韩关系/王晓波 (321)
 6. 评析朝鲜的核战略/金祥波 (338)
 7. 我国对韩国基础教育研究述评/俞爱宗 (351)
- 附录 (369)

《王会篇》所载东北主要古族考述

——兼与都兴智先生商榷

刘子敏(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专业)

都兴智先生两次赐教^①,就东北某些古族古国问题发表高见,笔者实受益匪浅,其中主要涉及的乃是东胡、孤竹、秽貊及箕氏朝鲜问题,但目前来看,都先生的某些见解,实有再商榷之必要,因此为弄清相关问题,笔者从《逸周书·王会篇》所载东北主要古族进行考述入手,谈谈与都先生的不同见解,有不当之处,还望都先生不吝赐教。

一、《王会篇》所载历史的可靠性

众所周知,《逸周书》乃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史书之一。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该书原名《周书》,凡71篇,班固自注云:“《周书》即《周史记》”。可见其为记载周代历史的著作。颜师古曾引刘向之语,谓该书“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由此可见,《逸周书》是孔子在删定《尚书》百篇之后剩余的关于周代的一部分史料,也正因为如此,东汉中期著名学者许慎(58—147)在《说文解字》中于“周书”的前面增加了一“逸”字,名之《逸周书》。

^① 都兴智:《关于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关于东北古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答刘子敏先生》,《史学集刊》2006年第7期。

《逸周书》的编撰时间可能较晚,也许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所记载无疑应是上自周文王、武王,下迄周灵王,即自西周而到春秋约六百年之间的史事,其史料价值还是不必置疑的。梁启超在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先殷》、《世俘》诸篇,益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梁启超对《逸周书》的看法,诚然是正确的。事实上,《左传》、《战国策》、《史记》、《说文解字》以及马融的《论语说》、郑康成的《周礼注》、《仪礼注》等,都曾引用过《逸周书》中的史料,足见该书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流行了。当然,《逸周书》的记载并不限于诰誓号令,而其中还涉及有关生活活动、哲学宗教、历史事件等内容,尽管有些内容有后人增添篡改的痕迹,但从整体看,向来被认为是研究周代历史颇有价值的重要资料。

从汉至晋,《逸周书》皆为全本。西晋五经博士孔晁为之作注,注语虽然颇为简单,但对后人解读该书来说,却大有裨益,遗憾的是,有些篇章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逐渐亡佚,到颜师古为《汉书·艺文志》作注时,发现“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后来又亡佚三篇,因此,今存孔晁所注者,仅有四十二篇。今本七十一篇,是旧本《逸周书》与《汲冢周书》相结合的产物,而其中缺十一篇,实际只有六十篇,无注者十八篇。

《王会篇》在《逸周书》中独具特色,它记载的是东北古族古国参加周天子召集的“成周之会”的盛事,语言古朴简练,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有趣的是,所载古族古国,竟没有著名的箕子之国古朝鲜,对此,有些学者颇为迷惑。其实,《王会篇》不载“朝鲜”,其原因很简单,即彼时“朝鲜”尚未诞生。从我国的史书记载来看,“朝鲜”之称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笔者受蒙文通、罗继祖的启发,认为箕子之国即古书所载“古之辰国”,该国的后裔率部北迁,同大同江流域的良

夷相融合,并改国号为“朝鲜”^①。从这一认识出发来看待都兴智先生的“古朝鲜说”,彼此的分歧就太大了。当然,学术观点的不同是正常现象,仅就箕子之国初建的地理位置来看,除上述朝鲜半岛南部说之外,尚有辽西说、辽东说、朝鲜平壤说等,而都兴智先生则一方面主张“箕子曾到朝鲜半岛建立政权”,一方面又主张“辽东之地,也曾是孤竹国的势力范围”,并肯定了“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之说的正确性^②。若按这种理解,箕氏朝鲜俨然是彼时东北亚地区土地辽阔的大国了。其实并非如此,我们通过对《王会篇》所载主要古族古国分布及变迁情况的分析便可了然了。

二、冀北及辽西诸族的分布与变迁

(一) 山戎的地望及消亡

从古文献的记载来看,山戎在我国的传说时代而至夏商时期就已存在了。《大戴礼记·五帝德》与《史记·五帝本纪》皆载北方之山戎、发、息慎在虞舜时期就同中原建立了联系。又据《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武王灭殷之后,曾宣布:“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关于山戎的地理位置,《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为之归纳了四种见解:“一是认为山戎在今燕山山脉滦河以至七老图山脉一带。二是认为山戎在今西喇木伦河,主此说者认为山戎即东胡之先,故与东胡在同地。三是认为山戎在今大凌河流域。四是认为山戎在无终,今河北省玉田县附近”。但依笔者之见,这四种说法皆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楚山戎在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空间。虞舜乃

① 刘子敏:《关于古“辰国”与“三韩”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苗威、刘子敏:《箕氏朝鲜研究》,《东北史地》2004年第8期。

② 都兴智:《关于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关于东北古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答刘子敏先生》,《史学集刊》2006年第7期。

至夏代,山戎应是一个族群,或称原始民族,其分布区应是今燕山南北地区,亦即辽西地带。但是,这一族群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巨大变化,换言之,由于居民的流动和变化,古老的山戎地区在进入青铜时代之后,便分化或形成了诸如《王会篇》中所载之辽西诸族,而周代的山戎,亦仅限于今燕山山脉、滦河以至七老图山脉一带的部族了。也正因为如此,周武王在谈到其北土时,就没有提及山戎,而仅用“燕”来替代之。《王会篇》所载山戎,即是业已变化了的山戎。考古界把在今冀北自七老图山至滦河流域、燕山、军都山一带发现的以含直刃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之一的考古文化视为山戎文化,同在辽西地区以含曲刃青铜剑为主要特征之一的夏家店东胡文化较清楚地区分开来^①,为我们了解周代山戎的活动范围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如此说来,西周及东周之初的山戎之南应为姬燕,其东北应是东胡的所在地。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东胡、山戎皆在燕国之北,但东胡与燕并不邻接,而邻接的山戎却常与燕国发生关系,公元前八世纪,山戎曾越过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及公元前七世纪,“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伐山戎,山戎走”。《春秋谷梁传》载,“(齐桓公)北伐山戎,为燕辟地”。此后,山戎之地为燕所占,山戎消亡,遂不见于史。

(二)孤竹的地望与消亡

《王会篇》载有孤竹之族,孔晁注云:“孤竹,东北夷”。《孟子》云:“孤竹之君,居北海之滨”。过去,有人曾说孤竹国为“山戎所居”^②,似将孤竹与山戎混为一谈。《国语·齐语》汉韦昭注:“令支,今为县,属辽西,孤竹之城在焉”。《后汉书·郡国志》云:“令支县,有孤竹城。”这里似乎又将令支与孤竹混为一谈了。《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孤竹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无论是从文献记载看还是从考古发现看,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孤竹的分布

① 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② 江永:《春秋地理考实》。

区应自今河北省的卢龙县一带而至辽宁省的喀左县地区。上世纪70年代初,曾于卢龙县境内殷代晚期的墓葬中,出土过饕餮纹陶鼎、乳钉纹铜簋、弓形器以及金腕饰等物,有人认为,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些随葬品可能是商的同姓国孤竹的文化遗物^①。1973年在辽宁省喀左北洞一号坑中出土五件涡纹铜罍及一件勾连雷纹铜甗,其中一件铜罍上铸有六字铭文,据考证,这六个字即为“父丁孤竹亚微”^②。显然,这组铜器应为孤竹的遗物是毫无疑问的,其中的“微”即是孤竹第八代竹侯,也就是闻名史册的伯夷、叔齐的父亲^③。当武王灭商之后,虽伯夷、叔齐因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但依然有孤竹的其他贵族为周所封,而彼时燕国的势力业已到达了辽西地区,包括新的竹侯在内的辽西诸族,皆在燕侯的控制之下,这从辽西地区出土的诸多周代青铜器便可知晓,此不赘述。但是,后来,由于北方民族的崛起,燕国在辽西的统治地位不能自保,于是其疆域便大大向南退缩,山戎、令支、孤竹等皆与燕国为敌,只是在齐桓公北伐山戎时,孤竹也遭受沉重打击,从此孤竹之国的存在遂不见于史。

(三) 令支的地望及消亡

《王会篇》载有“不令支”之族,孔晁注曰:“不令支,皆东北夷”。其中的“不”字应是衍文。《国语·齐语》云:“(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剋令支,斩孤竹。”韦昭注云:“二国,山戎之与也。”《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认为令支“地近于孤竹,在渤海之滨”,而其活动地区应“在今河北省迁安一带”。后一说法显然是没有错的,但“在渤海之滨”的见解是不符合实际的,其理由很简单,即迁安县乃在卢龙之西北,表明令支应在山戎与孤竹之间,并不滨海,而滨海者,应是孤竹。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② 魏凡:《就出土青铜器探索辽宁商文化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③ 刘子敏:《孤竹不是游牧民族》,《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令支的消亡,与孤竹同。

(四) 屠何的地望及消亡

《王会篇》载有“不屠何”,孔晁注云:“不屠何,亦东北夷也。”其中的“不”字亦应是衍文。关于屠何的历史,学者有其前身为殷代“土方”之说,而“土方”的分布乃在“两土河(老哈河和牐牛河)”流域^①。笔者认为,屠河分布于牐牛河流域还是可信的。《东北历史地理》将其置于今小凌河下游的锦州一带,视“徒河”为今女儿河。这一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不论怎样,周代的屠何之族应与孤竹、东胡相邻还是不成问题的。据史书记载,屠何也是齐桓公北伐征服的对象。《管子·小匡第二十》载:“中救晋公,擒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冠始服;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屠何的命运与孤竹、令支是相同的。

(五) 齐桓公征服的辽西之秽、貊

都兴智先生在《答刘子敏先生》一文中,值得商榷的问题颇多,其中就有关于孤竹的“势力范围”是否曾达辽东地区以及齐桓公北伐所到达的地区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都先生的错误是很明显的。通过前文的考述可知,孤竹的领域向北亦仅到达大凌河的上游地区,而其东可达渤海之滨,它的北边是屠何及下文所要考察的秽貊,很难想象,在冀北及辽西诸族中其实力并不强大的孤竹会吞并屠何、秽、貊,进而越过今医巫闾山将其势力发展到辽河以东地区,都先生的论点,除了裴矩那句靠不住的说法之外,无论是在文献学还是在考古学方面,是找不到任何可靠根据的。至于齐桓公所到达的地方,都先生仅根据“斩孤竹而南归”这一说法就武断地说“齐军只抵今河北卢龙一带,并未到达箕子朝鲜的势力范围,怎么会与箕子朝鲜作战呢?”笔者之所以说“武断”,不是没有根据的。其一,对于文献记载,都先生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或说虽知其二,而这“二”不利于都先生的

① 金岳:《东胡源于土方考》,《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

立论。事实上,齐桓公不仅击走了山戎,征服了令支和孤竹,而且还征服了孤竹之北的屠何和秽、貊,齐军所到,至少包括今医巫闾山以西的阜新、义县地区。《管子·小匡篇》云:“桓公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貊”。《王会篇》中有“秽人”与“发人”之载,说明秽和貊(发)应是两个民族,而都兴智先生主张“涉即貊”,双方看法迥然有别。关于两种意见孰是孰非的问题,将在下文中详述,但退一步讲,若依都兴智先生关于“涉即貊”为“指东胡一类的部族”的见解来看问题,齐桓公的北伐毕竟是涉及到了诸如东胡之类的民族,既如此,又怎能说齐军的北伐仅到卢龙县地区就没有再北进过呢?

(六) 东胡族的地望及其变迁

学界在东胡、山戎、孤竹、令支、屠何、秽、貊等族的探讨过程中,常常发生将其中两个民族混为一谈的现象,但只要看一看《王会篇》便可知道,将本相互独立的不同的民族混为一谈是多么不科学。东胡的出现至少应在商末周初之时,其分布地区应在山戎、令支、孤竹、屠何之北,具体说,当在今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但是,后来东胡的分布区曾有所伸缩。就目前来看,中外不少学者皆将夏家店上层文化视为东胡文化,其中靳枫毅先生的研究最有说服力。靳先生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①一文中,按照时间的先后及其文化类型的特征,将夏家店上层文化分为三个类型。其一是“大井类型”,从分布地域上看,“这个类型处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圈的北部,基本上是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北面包括乌尔吉木伦河流域、查干木伦河和嘎苏太河流域,以及大兴安岭山脉南段东麓丘陵山地,南面包括英金河以北、老哈河中下游与牯牛河中下游流域一带”,而这一类型的年代上限可能早到西周早期或商、周之际,其年代下限则延续到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东胡,恰处于《王会篇》与《管子》所记载的历史时期。其二是“南山根类型”,其分布地域“主要是以老哈河中上游为中心,东西两翼包括坤

^① 见《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都河、英金河、阴河流域,以及教来河中上游流域一带。西部和西南部……基本上到伊逊河上游和七老图山脉为限,……东部伸展至库伦旗”,而其年代上限大约在西周早中期,或西周中期前后,下限约可到春秋早期或春秋早中期。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东胡正是《诗经·韩奕》所反映的周宣王中兴或前后的东胡。彼时燕国在辽西地区的势力已受到明显的削弱,东胡由周初的聚居地开始向奴鲁儿虎山的西北、七老图山东北地区的老哈河上游一带移动扩张,西周为确保其“北国”的安定,遂任命新的韩侯专管秽、貊之地,以减轻燕国所承受的压力。其三是“十二台营子类型”,这一类型的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大凌河以及牐牛河中下游流域一带,西到努鲁儿山,东达医巫闾山,北到柳河上游,东北以柳河中下游为限而未过彰武、新民,西南基本上不超过河北青龙,其年代的上限约在西周晚期,下限约在战国早中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东胡应是齐桓公北伐辽西诸族之后、燕国贤将秦开击走东胡之前的东胡,东胡所占领的这一地区恰是燕国、韩侯之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孤竹、令支、屠何、秽、貊之故地。从上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不同类型及其不同年代不同地域来看,恰好证明了东胡由偏北向偏南发展的历史进程;在燕人退出辽西地区以后,东胡向南发展,但由于山戎、令支、孤竹、屠何、秽、貊等族的存在,其南下的势头必然受阻。及齐桓公北伐之后,一方面为燕人的北进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为东胡的南下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燕国为其强邻齐、晋所牵制,北进的速度必然会放慢,而东胡人也就趁此良机迅速占领了辽西全境,在战国早期,遂成为燕国的北方劲敌。至于彼时朝鲜,同燕国隔海是近邻,笔者在某些著述中曾有多次提及,此不赘述。

三、辽东与朝鲜半岛的古族

(一)发(貊)人的历史变迁

前文曾述,在我国的传说时代就有“发”或“北发”与山戎、息慎

存在于我国东北地区,在周武王时期,“亳”与“肃慎”同燕皆为中原王朝的“北土”。实际上,发、亳、貉(貂)皆为同音异写,《王会篇》所载之“发人”亦即“貂人”。《王会篇》又有“秽人”之载。由此可见,秽和貂分明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分布区,其考古文化亦各自有其特点。笔者认为《王会篇》中的秽和发(貉)皆包括了辽西者与辽东者,而从这点来考虑问题,《诗经·韩奕》中的追(秽)、貂及《管子》中的秽、貂与《王会篇》的记载便是一致的了。关于“韩侯之国”是否在东北存在的问题,笔者则是肯定的。程俊英、蒋见元在其所著《诗经注析》中对“奕奕梁山”的“梁山”解释为“在今河北省固安县附近”,对韩侯其人的解释,更为明确:“韩侯,春秋前有二韩:一为姬姓之韩,受封于武王之世,在今陕西韩城县南,春秋时被晋国所并。一为武穆之韩,受封于成王之地,武王子封于此,在今河北省固安县东南,即此诗的韩侯(据陈奂《传疏》)。”都兴智先生将“梁上”视为今吕梁山,实为附会之说,至于都先生只相信山西有过韩侯而否定河北曾有过韩侯,亦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韩奕》的叙事脉络应是:首章叙韩侯由韩赴镐京(在今陕西省长安县境)受宣王之册封,次章叙韩侯入觐周天子及宣王赏赐韩侯,第三章叙韩侯离开京师回国而路过屠城(在今西安市东)受款待的情况,第四、五章叙韩侯的婚姻状况及韩侯之国的地理位置、丰富物产,最后一章乃叙韩侯赴任及治理北国之追(秽)、貂有政绩。韩侯受封、领赏后,迎娶了周厉王的外甥女、周宣王的卿士驷父的女儿韩姑,从这一事件的叙述中并看不出这韩侯之国是在山西的任何蛛丝马迹。都先生断定笔者的“辽西之秽”、“辽西之貂”的见解乃与郑玄的观点有些瓜葛,实际上也是一种武断的说法。笔者在《貂族考》^①一文中特设“关于貂人‘移动说’一节”,明确否定了郑玄及后来某些学者(如蒙文通、白鸟库吉)认为“西周晚期居于周王畿之北者是獫狁和戎族,其势力很大,不是像韩侯这样的人所能统治得了的,将追貂的居地置于王畿之北毫无道理。”笔者认为,历史上的秽、貂乃是东北地区土生土长

① 见《北方民族》1996年第1期。

的古代民族。至于貊人的分布区,“辽西之貊”应在医巫闾山之西、屠何之东,即今义县地区,而“辽东之貊”则分布于今医巫闾山以东而至清川江北岸地区,其考古文化受夏家店下层文化、商周文化,特别是受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颇显。就曲刃短剑的情况而言,貊人分布区的遗存只能视为流而不能视为源,关于这一点,靳枫毅先生在其《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①中分析得十分清楚,此处不述。辽东之貊(发)在春秋时曾同箕氏朝鲜一起至山东半岛的齐国进行过贸易,及至战国时期燕人东扩之后,皆纳入了辽东郡的辖区,燕长城之内的貊人逐渐融入燕、汉之族,而长城以外的梁貊、小水貊以及《山海经》所载貊国(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后来皆融入高句丽族之中,从而成为高句丽族的族源之一。

(二) 秽人的历史变迁

《王会篇》载有秽人,而笔者曾撰《秽族考》^②进行过专题研究,认为“辽西之秽”应在“辽西之貊”之北,显然应是今北票一带,包括秽、貊在内的辽西诸族在齐桓公北伐、东胡南下之后,皆融入东胡之中,他们及其后裔同东胡共同创造了晚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至于“辽东之秽”,应是考古界发现并命名的“西团山文化”的主人。都兴智先生关于今辉发河流域和北流松花江流域为“貊国”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西团山文化”分布区的秽之变迁,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去考虑,其一是该地的土著秽人进入铁器时代以后,逐渐转化为夫余族,其二是一部分秽人向东越过张广才岭、威虎岭而迁入今延边地区、牡丹江以东地区,以及俄国滨海地区、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地区,同当时的古肃慎人融合而形成了沃沮族,而有一部分秽人沿朝鲜半岛东部沿海地区的“走廊”继续南下,同当地的居民融合而形成了东秽之族。《王会篇》不载夫余、高句丽、沃沮、东秽乃至挹娄之名,原因很简单,即这些民族在西周之时尚未形成,而这些民族都应是铁

① 见《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

② 见《北方民族》2000年第1期。